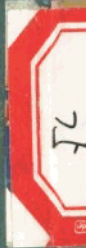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選集

鄭振鐸
茅盾
魯迅
鄭伯奇

周作人
郁達夫
洪深
朱自清



PDG

編者的話

這集子的八篇文章，乃選自趙家璧先生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各集卷首的「導言」，其篇名和副題都是另行加上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的史料大結集。全書十鉅冊，規模宏偉，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冬，在當時的文壇上，這是偉大的創舉，有着重大的意義——它為中國新文學史寫下了光彩的第一頁。

這十鉅冊中，包括有新文學理論的發生、發展、論爭，以及各家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的代表作品。每一選集都是由當代著名文學家精心編選的，如胡適先生主編「建設理論集」，阿英先生主編「史料、索引」，鄭振鐸先生主編「文學論爭集」，茅盾先生主編「小說一集」，魯迅先生主編「小說二集」，鄭伯奇先生主編「小說三集」，周作人先生主編「散文一集」，郁達夫先生主編「散文二集」，朱自清先生主編「詩集」，洪深先生主編「戲劇集」。除「史料、索引」集外，其餘各集主編人在其卷首都寫有長篇「導言」，對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間各方面的發展和各種文學創作活動，分別作了全面的概述和評價。這對想認識或研究中國新文學發展史的

讀者來說，確實是一批極系統化而又非常有價值的史料。我們編選這集子的目的，就是爲了保存這批珍貴的史料。但根據目前需要，本選集祇收其中導言八篇。

這八篇文章都是三十多年前所寫的，在今天看來，雖然在某些論點上和當前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距離，但作爲史料來看，它還是有着極大的參考價值，對於我們認識或研究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編者 一九六一年十月

目 錄

五四以來文學上的論爭·····	鄭振鐸·····	一
現代小說導論(一)·····	茅盾·····	二九
——文學研究會諸作家		
現代小說導論(二)·····	魯迅·····	七三
——彌灑弄原狂飄等文學團體諸作家		
現代小說導論(三)·····	鄭伯奇·····	九一
——創造社諸作家		
現代散文導論(上)·····	周作人·····	一二五
現代散文導論(下)·····	郁達夫·····	一四五
現代戲劇導論·····	洪深·····	一六九
現代詩歌導論·····	朱自清·····	二八一

五四以來文學上的論爭

鄭振鐸

—

編就了這部「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論爭集」之後，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劉半農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話詩稿」云：

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的進步，就把我們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於慚愧之餘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

這是半農先生極坦白的自覺的告白。但一般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幾年，當他們努力於文藝革新的時候，他們却顯出那樣的活躍與勇敢，使我們於今日讀了，還「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這不僅僅是因為憧憬於他們的時代，迷戀於歷史上的偉大的事業的成就，當然，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動，確可使我們心折的。在那樣的黑暗的環境裏，由寂寞的呼號，到猛烈的迫害的到來，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興奮與苦鬥之中生活着。他們的言論和主張，是一步步

的隨了反對者們的突起而更爲進步，更爲堅定；他們紮硬寨打死戰，一點也不肯表示退讓。他們是不妥協的！

這樣的先驅者們的勇敢與堅定，正象徵了一個時代的「前夜」的光景。

當陳獨秀主持的「青年雜誌」於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時，——那時我已是一個讀者——只是無殊於一般雜誌用文言寫作的提倡「德智體」三育的青年讀物。

後來改成了「新青年」，也還是文言文爲主體的，雖然在思想和主張上有了一個激烈的變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在一九一七年發表。這誠是一個「發難」的信號。可是也祇是一種「改良主義」的主張而已。他所謂文學改良，祇「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倣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他所主張的祇是淺近平易的文字，祇是「不避俗字俗語」的文字。但他「以施耐菴曹雪芹吳趸人為文學正宗」，且以為「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不過他還持着商榷的態度，還不敢斷然的主張着非寫作白話文不可。

陳獨秀繼之而作「文學革命論」，主張便鮮明確定得多了。他以「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十八妖魔輩」，而斷然的加以排斥。「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他高張着「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答胡適的信道：「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

他是這樣的具有烈火般的熱誠，在做着打先鋒的事業，他是不動搖，不退縮，也不容別人的動搖與退縮的！

革命事業乃在這樣的徹頭徹尾的不妥協的態度裏告了成功。

他們的影響漸漸的大了。陳獨秀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文科學長。胡適剛由美國回來，也在北大教書。同事的教授們還有錢玄同、沈尹默、劉復、李大釗、周作人、魯迅等和他們互相

呼應，互相討論。北大的學生傅斯年等也起而和之。

他們的主張因了互相討論的結果，更是確定鮮明了，且也進步了不少。錢玄同說：「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爲美文，此爲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輩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與陳獨秀書」）劉半農的「我之文學改良觀」，也是一篇有力的文章。錢玄同不大贊成舊小說，尤惡舊劇，劉半農也以爲「余贊成小說爲文學之大主腦，而不認今日流行之紅男綠女之小說爲文學。」這都是一種具有很大的進步的言論。他們已經不單注重到形式的，且也注重到內容的問題了。

一九一八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的「新青年」，便實行他們自己的主張，完全用白話做文章。在這一卷裏，胡適有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要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一篇可算是他們討論了兩年的一篇總結論，也可以說是一篇文學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

二

當他們在初期的二三年間討論着文學革命的問題的時候，同情者們固然是一天天的增多了，

反對的人却也不少。不過都不是很有力量的。當時有一班類乎附和的人們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不少的言論，却往往是趨於凡庸的折衷論。曾毅說道：「昔之人欲售其主張，恒藉其選本以樹之鵠，非如現在坊間選本之無甚深義也。僕以爲足下既張革命之軍，突使一般青年觀之，茫然莫得其標準之所在。則莫妙於取古今忙人之詩文，與言宗旨稍近者，詩如李陵陶潛及古詩二十九首之類，文如黃太沖原君王守仁祭壘旅文之類，選爲課本，使人知有宗向。由是以趨於改進，似更易爲功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方宗嶽的見解，尤爲可笑：

由是觀之。鄙意對於胡先生之說。既不敢取絕對的服從，則有折衷之論。乎。曰有。即分授之說是也。對於小學生。則授以普通之應用文字。文理與白話二者可斟酌而並取。中等以上之學生。則取純一文理，而示以深邃精奧之所在。如此則庶幾無人不識應用之文字。而所選奧文理者，亦自有一般專門之學者探討。而使古來本有之經理藝術不因是而火其傳也。胡先生其首肯乎。

余元濬說道：

吾人既認白話文學爲將來中國文學之正宗。則言改良之術。不可不依此趨向而行。然使今日即以白話爲各種文字。以予觀之。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以緩。不如姑緩其行。歷代文字。雖以互相摹倣爲能。然比較觀之。其由簡入繁。由深入淺。由隱入顯之跡。亦頗可尋。秦漢文學。異於三代文學。魏晉文學。異於秦漢文學。隋唐文學。異於魏晉文學。宋以後文學。異於隋唐文學。苟無時時復古之聲。則順日進之勢。言文相距。近。國民文學必發達而無疑。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學術。一面順此日進之

勢。作極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語。而將來合於國語可操預券。（白話小說詩曲自是急務）

他們都是「改良派」，「恐矯枉過正。反貽人之唾棄。急進反緩。不如姑緩其行」的人物。這些折衷派的言論，實最足以阻礙文學革命運動的發展。

好在陳獨秀們是始終抱着不退讓，不妥協的態度的，對於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信守着，「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遂不至上了折衷派的大當。

一九一八年的十二月，陳獨秀們又辦了一個白話文的週刊，名爲「每週評論」。緊接着，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也辦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名爲「新潮」。他們都和「新青年」相應和着。

他們的勢力是一天天的更大，更充實；他們的影響是一天天的更深入於內地，他們的主張是一天天的更爲無數的青年們所信從，所執持着了。

白話文的勢力更擴充到日報裏去。不久的時候，北京的「國民公報」，藍公武主持着的一個研究系的機關報，也起而響應之。以後，同系的一個日報，即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也便出來擁護他們的主張。

三

這面「文學革命」的大旗的豎立是完全的出於舊文人們的意料之外的。他們始而漠然若無

觀；繼而鄙夷若不屑與辯，終而却不能不憤怒而咒詛着了。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號上同時刊出了王敬軒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和劉復的「復王敬軒書」。王敬軒原是亡是公烏有先生一流人物。託爲王敬軒寫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錢玄同的手筆。

爲什麼他們要演這一齣「苦肉計」呢？

從他們打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以來，始終不曾遇到過一個有力的敵人。他們「目桐城爲謬種，選學爲妖孽。」而所謂「桐城，選學」也者却始終置之不理。因之，有許多見解他們便不能發揮盡致。舊文人們的反抗言論既然竟是寂寂無聞，他們便好像是盡在空中揮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所謂王敬軒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舊文人們的許多見解歸納在一起，而給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擊的。

可是，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運動也便來了。

古文家的林紓來放反對的第一砲。他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重要的主張是：「即謂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實則此種教法，萬無能成之理，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

其實不必等到「百年」，林紓他自己已迫不及待的親自出馬來「正其非」了。他給了一封書

天下唯有此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嗚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之「金瓶萃篇」，「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孔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師之一二語即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尙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籍，證以鐘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篆籀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瓊燕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鳩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言，仍令我爲鳩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

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利而施恣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_聖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

他的論點是很錯亂的。蔡元培的覆信，辭正義嚴，分割事理，至爲明白。他是沒有話可以反駁的。

但他衛道「正」文的熱情，又在另一個方向找到出路了。他連續的在報紙上寫了兩篇小說：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夢」，兩篇的意思很相同；不過一望之俠士，一託之鬼神罷了；而他希望有一種「外力」來制裁，來壓伏這個新的運動却是兩篇一致的精神，謾罵之不已，且繼之

以阻咒了！

同時，北京大學裏也另有一派守舊的學生們，則出版一個月刊「國故」，作擁護古典文學的運動。

當時是安福系當權執政。謠言異常的多。時常有人在散佈着有政治勢力來干涉北京大學的話，並不時的有陳胡被驅逐出京之說。也許那謠言竟有實現的可能，假如不是「五四運動」的發生。

林紓的熱烈的反攻「新青年」同人們乃是一九一九的二三月間的事。而過了幾月，便是「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安福系不久便坍了臺，自然更沒有力量來對於新文學運動實施壓迫了。

「五四運動」是跟着外交的失敗而來的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其實也便是這幾年來革新運動所蘊積的火山的一個總爆發。這一塊石片拋在靜水裏，立刻便波及全國。上海先來了一個猛烈的響應，總罷市，罷學，以爲北京學生的應援。被認爲攻擊目標的曹汝霖輩遂竟被罷免了，各地的學生運動，自此奠定了基礎。說是政治運動，愛國運動，其實也便是文化運動。

白話文運動的勢力在這一年裏突飛的發展着。反對者的口完全的沈寂下去了。「有人估計，這一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學研究會在這一年的冬天成立於北京。「小說月報」也在這時候改由沈雁冰編輯，完全把內容改革了過來，成爲新文學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機關雜誌。新文學運動在這個時候方才和一般的革新運動分離了開來，

而自有其更精深的進展與活躍。

「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的一個機關刊物，也附在「時事新報」裏開始發行。在第二期的新文學運動裏盡了很大的力。

日本留學生郭沫若、郁達夫等，也組織了一個文藝團體，名為創造社，刊行「創造季刊」。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新青年社的白話文運動發展到最高的頂點。以後，這個運動便轉變了方向，成為純粹的新文學運動。同時，新青年社便也轉變而成爲一個急進的政治的集團。

而初期的爲白話文運動而爭鬥的勇士們，像錢玄同們，便都也轉向的轉向，沉默的沉默了。

祇有魯迅、周作人還是不斷的努力着，成爲新文壇的雙柱。他們刊行着「語絲」和「莽原」，組織未名社，在新文學運動裏繼續的盡着力，且更勇猛的和一切反動的勢力在爭鬥着。

一方面我們感覺得新勇士們的那末容易衰老，像大部分的「新青年」的社員們，同時却也見到有不老的不妥協不退却的勇士們在做青年們的指導者。

四

文學研究會活躍的時期的開始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這時候，「小說月報」，一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的文學刊物，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們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幾乎變成了另一種全新

的面目。和「小說月報」相呼應着的有附刊在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這旬刊由鄭振鐸主編，後來刊行到四百餘期方才停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着爲人生的藝術，標示着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爲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於流俗的陷溺與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

他們排斥舊詩舊詞，他們打倒鴛鴦蝴蝶派的代表「禮拜六」派的文士們。

他們翻譯俄國、法國及北歐的名著，他們介紹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着苦難的社會而爲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裏面的，他們乃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國家社會的苦痛與災難的。

關於這一類的言論，他們在「文學旬刊」以及後來的「文學週報」（即「旬刊」的後身）上發表现得最多。可惜這幾種初期的刊物，經過了一二八的戰役，幾已散失無遺，很難得在這裏把它們搜集起來。

沈雁冰在「什麼是文學」裏把他們的主張說明了一部分：

名士派重疏狂脫畧，愈隨便愈見得他的名士風流；他們更蔑視寫真，譬如見人家做一篇詠陶然亭的

詩，自己便以詩和之，名勝古蹟，如蘇小小墓，岳武穆墓，雖未至其地，也喜歡空浮的寫幾句，如比干之墳，實在並沒有的，而偏要胡說，這真所謂有其文，不必有其事了（這兩句便是他們不注重真的供辭）。所以他們詩文中所引用的禽鳥草木之名，更加可以祇顧行文之便，不必核實了。新文學的寫實主義，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譬如講余山必須至少去過一次，必不能放無的放矢。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學於社會的價值，他們的作品，重個人而不重社會；所以拿消遣來做目的，假文學罵人，假文學媚人，發自己的牢騷。新文學的作品，大都是社會的；即使有抒寫個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類共有，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鳴的，決不像名士派之一味無病呻吟可比。新文學作品重在讀者所受的影響，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將個人意見顯出自己文才。新文學中也有主張表現個性，但和名士派的絕對不同，名士派祇是些假情感或是無病呻吟，新文學是普遍的真情，和社會同情不悖的。新文學和名士派中還有很不同的地方，新文學是積極的，名士派是消極的。新文學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詩中多抒個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讀後，得社會的同情、安慰和煩悶。名士派呢，面上看來，確似達觀，把人間一切事務，都看得無足重輕，其實這種達觀不過是懶的結晶而已。

所謂「描寫社會黑暗，用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便是寫實主義者的描寫的手法。沈雁冰又有「一篇『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對於文學的『積極性』尤加以發揮：

所以近來論壇上對於那些吟風弄月的，「醉罷美呀」的所謂唯美文學的攻擊，是物腐蟲生的自然的趨勢。這種攻擊的論調，並不單單是消極的；他們有他們的積極的主張：提倡激厲民氣的文藝。

我自然不贊成托爾斯泰所主張的極端的「人生的藝術」，但是我們決然反對那些全然脫離人生的而且濫講的中國式的唯美的文學作品。我們相信文學不僅供給煩悶的人們去解悶，逃避現實的人們去陶醉；

文學是有激厲人心的積極性的。尤其在我們這時代，我們希望文學能够擔當喚醒民衆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我們希望國內的文藝的青年，再不要閉了眼睛冥想他們夢中的七寶樓臺，而忘記了自身實在是住在豬圈裏。我們尤其決然反對青年們閉了眼睛忘記自己身上帶着鍊鎖，而又肆意譏笑別的努力想脫除鍊鎖的人們，阿Q式的「精神上勝利」的方法是可恥的！

巴比塞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爲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着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爲目的了。」國內文藝的青年呀，我請你們再三的忖量巴比塞這句話！我希望從此以後就是國內文壇的大轉變時期。

沈雁冰又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及「社會背景與創作」把那主張更闡發得明白。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是他們的共同的見解。「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裏更應該注意這社會背景」。（「社會背景與創作」）「注意社會問題，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這便是他們的宣言。

他們曾在「小說月報」上出過「俄國文學專號」及「被壓迫民族文學專號」（？）。並且他們在創作上也會多少的實現過他們的主張。

不久，北平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在「晨報」上附刊一種「文學旬刊」，廣州的一部分文學研究會會員也出版一種廣州「文學旬刊」。葉紹鈞、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創辦「詩